

## 转译界面: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 恰切进路

史献芝 严凤莲\*

【摘要】在思想观念深刻嬗变和多元社会思潮相互混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关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浮沉,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在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建构物质维度、民主维度和法治维度的转译界面,把以注重理念和以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要特色,并且以理论、概念体系等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些较为抽象和远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到民众的意识中去,并使之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取舍与选择的价值自觉,可能是切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转译界面;意识形态认同

处于不断“试错”和修正状态的社会发展历程一再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热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并成为民情和习性时,才能为现有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和谐提供牢固的社会基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sup>①</sup>这即是说,谁掌握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并培植出有凝聚力的价值认同,谁也就掌握了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因此,谋求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在“去意识形态化”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背景下,审慎应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

---

\*史献芝,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10023;严凤莲,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23000。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社会矛盾的生成机理及化解机制研究”(15BKS04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矛盾化解问题研究”(13ZZB007)和江苏省高校社科基金项目“当前社会矛盾的生成机理及化解机制研究”(2013SJB71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看,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统治阶级和社会利益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自觉而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乃至国家关系的系统化了的观念、价值体系和理论学说等,即作为上层建筑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和担当着论证与衡量现存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并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社会思想提供理论依据与文化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当代政治文献中尚未对主流意识形态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很显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集中反映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根本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探索和奋斗的主题。“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在把握了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深刻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鲜明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sup>①</sup>

当然,在繁杂的社会意识形态谱系中,何为主流意识形态呢?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澄清。简言之,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指“按照一些道德规范、一定的现实根据和自觉的一致性推理而被设计出来的信仰体系,以作为一个群体证明他们的措施和技术规范的合法性依据,这些措施和技术规范是为了保证那些要去维持、变革、颠覆或重构某种既定秩序的行为能够协调一致。”<sup>②</sup>在政治心理学的视域中看,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行为选择,影响着执政党活动的内容与方式,更为要紧的也影响着执政党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生存发展与未来和政治舆论生态。

“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sup>③</sup>藉此,夯实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和遵从而不是教条化的虚假认同,或者成为全社会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理想,实乃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原教旨”式的价值旨趣。回望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淡定深思、不难发现,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基础性的实践主题。虽然,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建设的路径方法和话语表达形式不尽相同或略有差异,但睿智和富有政治胆略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来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凝聚共识、统领社会发展航向的价值追求与理念却薪火相传。然而,客观地说,在思想观念深刻嬗变和多元社会思潮相互混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依凭于特定的话语路径和话语体系建构起来且进行充分论述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通过“急风骤雨”式的灌输、教化和政治劝谕等策略在公共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完全将其在民众的意识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确立起来,或者说没有完全能够获得民众的自觉认同,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认同弱化、虚化和若即若离的现象,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与无奈。必须指出的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在可控的区间范围内,但这也映射出了问题尚处于量变的过程中。即便如此,许多具有颠覆性、解构性的错误思潮与“主义”的频频出现和间或性的粉墨登场,也使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依稀可见。

诺斯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忠诚拥护。”<sup>④</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

①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4页。

②M. Seliger,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en Ltd., 1976, p.119.

③[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5页。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8页。

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①</sup>因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突破传统的、僵化的“灌输”与教化方式，更进一步寻求一种能让群众易于接受、理解与认可的言说或传播方式，就显得尤为要紧。所以，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实践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在厘清其发展的逻辑脉络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还需要仰仗通过建构一种民众易于接受的转化机制或装置，让其在真正回到民众生活、回到乡间的实践展演过程中慢慢体验与累积，才有可能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并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选择的价值自觉。

对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行动主体是什么？它们之间缘何又会存在着内在张力？为什么必须要依托一定的转化机制或装置来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二、转译界面与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勾连

从发生学视角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运动的本质，其实根底上是两类行动主体——接受主体（民众）和推行主体（统治阶级、执政党或社会精英等）在公共思想空间中一种彼此交互影响、互通交融和持续展演的互动性过程。从接受主体的维度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是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的习练过程；而从推行主体的维度看，与普罗大众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价值偏好、认知能力、公共性想象等方面都不相同甚至有着根本性差异的统治阶级、执政党或社会精英，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地建构与充分论述和依托于特殊的传播、教化等方式，使民众能够自觉接受自己建构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思想观点等价值诉求，则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我们相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终极主题就隐伏在两类行动主体之间交相互动的实践过程中，那么，问题就转化为：两类行动主体之间的互通交融，乃是辨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延伸开来视之，倘若民众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公共“舞台”的现身表演和实践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自觉“出场”和“在场”，而不是被迫卷入，那么，经由推行主体创造性建构与充分论述的主流意识形态则能够渗入民众的精神世界并获得他们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的价值自觉。反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效度不仅会被稀释，甚至变得平淡如水。这意味着，设若民众不能积极、深入、自愿的参与推行主体所“导演”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就谈不上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实践，甚至更不要去指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

可是，随着内聚性的“共同体”被撕裂和契约精神与权利意识的持续高涨，诸多利益诉求相左甚至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的两类行动主体在公共思想空间中似乎天然的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所以，如何克化这种天然的内在张力和实现两类行动主体之间的互通交融，则是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一个根本无法规避的难点。那么，在公共思想空间中，两类行动主体之间缘何会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呢？

对此，沿着两类行动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来勾勒问题产生的逻辑线索与机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切入路径。具体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关系网络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民众，是“知识权力关系的弱者”<sup>②</sup>，且呈现出一副不善言辞、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和习惯于通过直接经验思考的外在面相。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以生活的实践经验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知识和技能，但基于生存理性冷静甚或琐细的考量与谋划，并不怎么关心那些注重论述与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要特色和建构在抽象的法

<sup>①</sup>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3年8月21日。

<sup>②</sup> 赛学伟：《社区如何动起来？》，《读书》2015年第5期。



则、理论基础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他们更习惯于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亲身的实践体验来认知、理解和评价、“测量”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效能,或者说,民众的价值理念与心灵习性形成的基础不是抽象的思维运动,而是在观照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行为中慢慢走向一种意识自觉。而掌握着知识权力的推行主体则注重从理念出发来建构和阐述抽象的价值理论知识体系,并善于通过系统的理论表达、论证和逻辑推理与思维活动来习得一整套的价值理念与意识。也就是说,抽象的价值理论问题只是少数知识权力精英所关注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和语言系统。然而,民众日常所遇到的多数问题只是基于生存理性考量与谋划对具体私人事务的直接经验思考。如此,在相互碰撞与交锋的公共思想空间中,彼此相异的两类行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就的确无法规避。

显然,这要求我们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进程中,必须寻求切近可行的某种机制或装置,来克化两类行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站在时代社会关系的视角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绝不意味着“口号式”和“泛政治化”的呼喊、灌输与劝谕,也不仅仅是基于伦理和道德等概念体系的政治传播和讨论,而是需要充分深层次地洞察问题发生的内在缘由和具体时空条件的特殊性,通过建构恰切的转译界面这个意在刻画将抽象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细致化、具体化的实践行为的机制或装置,以此来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

因此,在现代交互性的社会化场景中,建构与民众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的特质相契合的转译界面,将那些注重理念和以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要特色,并且以理论、概念体系等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些较为抽象和远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经由民众的身体实践而渐次内化为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选择的价值自觉,就成为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 三、转译界面建构的多维进路

通常情况下,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往往呈现出“流动”的态势,它会随着特定诱因而发生,又随着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淡化、偏移甚至中断。哈贝马斯指出:“一种观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它就会顽强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无论遭到的障碍有多大,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sup>①</sup>而基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囿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决定了作为接受主体的民众不会也不能自发形成对抽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历经市场经济的多番洗礼和时空的层层打磨,已经被倒逼着向“多元共生思潮”的格局大尺度敞开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需要推行主体弯下身腰,以谦卑的态度小心翼翼地寻找恰切的转译界面,把以抽象理论和严谨言语叙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实现有效的“无缝衔接”,或将是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进一步凝聚中国共识、传播中国声音,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就,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sup>②</sup>,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转译界面又主要呈现在哪些维度上?或者说应该主要从哪些维度上来建构恰切的转译界面呢?其实,究其本源来看,贴近民众这一特定主体的认知习惯与模式,体察其心态、立场和利益诉求的特点,钩沉出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承载的

<sup>①</sup>E. O. Eriksen & J. Weigard, *Understanding Habermas: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p.46.

<sup>②</sup>王永贵、刘秦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价值理念与指向相一致的“社会场域”，乃是建构凝聚价值共识与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转译界面的核心和关键。

具体而言，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转译界面，主要展现为：

### （一）物质维度的转译界面

经济因素是任何意识形态建构、运行和发展的支撑性力量。“‘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①</sup>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否被广大民众所认同、接受与遵从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和实现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sup>②</sup>同时，“人们奋斗所争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sup>③</sup>布坎南也指出：“无论在其市场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sup>④</sup>进一步说，利益诉求的满足及实现程度是人类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的愿景性目标。“实际上，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sup>⑤</sup>因此，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⑥</sup>和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民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作为物质维度的转译界面，以此来证成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价值目标和夯实认同的物质基础，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接受与遵从。

在宽泛的意义上说，在物质维度这个“转移界面”上，设若世俗性意识极强的民众最关注的利益诉求问题能够得以有效的解决和实现，民众能够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自然会感到知足和幸福，执政党所宣扬和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自然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接受与遵从。换言之，对生存伦理的执着追求已牢牢地固化为民众一种特有的思维模式和评判准则。所以，并非是各种“色彩斑斓”的幻想与华丽的“辞藻”，而是现实利益诉求的满足度始终是支配民众行为选择的首要逻辑。因此，抓住民众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则是建构物质维度的转译界面的枢纽。现阶段，面对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贪腐行为泛滥、经济发展不均衡、文化发展不繁荣、公共精神隐没不彰、生态形势严峻、利益格局失衡、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多元思潮相互混搭和人们需求日趋多元多变等相互绞缠与抵牾的诸多问题，我们显然不能刻意回避，而应主动正视并积极回应。毋庸置疑，高瞻远瞩的中国共产党绘制的“全面深化改革”这幅划时代的蓝图，从全局出发，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秉承“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sup>⑦</sup>聚焦总体目标、科学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保障民权、消除贫困、群众路线、在共享中凝聚价值共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关乎民众根本利益诉求的公共问题。以畅通民意、赢得民心、促进和谐，为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奠定厚重的物质基础。

### （二）民主维度的转译界面

民主本身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社会恒久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圭臬。尤其是在民主业已博得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④[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⑤[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⑥习近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顶礼膜拜”地位的现代多元社会中,其至尊地位一如政治“神话”,不知道牵缠了多少人的政治诉求和实践激情。随着民主化进程的纵深发展,权力主体的下沉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现代多元民主治理首要的就是公共性的打造,是把政治空间开放给民众,以推动广大民众广泛有效的参与和介入,实现各种价值偏好的沟通、妥协与宽容,努力培育一种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实践行为选择的根本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接受与遵从都无法离开民主这个关键性的转译界面。

可以这么认为,在作为一种政府决策方法和程序的民主这个转译界面上,民众的广泛参与呼应了权为民所享,实现了民众政治诉求的自由表达,确保了民众的价值偏好与意见能够充分展开争论、协商、妥协与“碰撞”,能够达成政治上的“和而不同”和推动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同时,严格地讲,民主本身也是一种民众参与式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程序。“民主是处理无论什么社会要求、无论什么来自‘民意’或赞成民意的‘要求’的一种程序。”<sup>①</sup>“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使政府的法令具有合法性的并不仅仅是来自同意。合法性的来源不如说是来自普遍同意的政治过程。在这些法令上其所以给予同意(包括那些实质上的反对者),是因为这些决定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取得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没有民主程序,也就不会达成真正的重叠共识与认同。

人类社会的民主实践和政治学的研究经验昭示出:民众政治诉求的实现程度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其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充分保障广大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从更深层次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sup>③</sup>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因此,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转译界面,民众能够在民主操练的实践过程中实现其政治诉求和体验到民主的真谛。可以说,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旨归高度契合,彰显着浓郁时代“特色”和体现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彻底颠覆了民主与社会主义难以相容的错误见解,而且在实践中确保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融合,赋予了民众一个更为直接、更为顺畅、更为便利的表达政治诉求的“社会空间”,充分调动了每一个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目标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夯实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sup>④</sup>所以,民众亲自“出场”参与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民主实践与操练,不只是亲身品味到当家作主的愉悦与民主本身的“魅力”和实现政治诉求的过程,更要紧的是在相互交往、相互砥砺之中能够激发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因”。

### (三) 法治维度的转译界面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也是法治首要的伦理价值。近代以降,公平正义已然成了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一种“应然”状态与重要界碑。

---

①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② [美]卡尔·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6页。

③ 李萍、浦玉忠:《社会主义内涵的价值澄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公平正义,要求必须将各项权利平等地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或“各得其所应得”,必须将“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某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sup>①</sup>即“给每个人——包括给予者本人——应得的本分。”<sup>②</sup>而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正当性辩护,则是夯实广大民众价值共识与认同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绳。也就是说,民众的权利与义务,所得与应得,实现或达至彼此的横平或对等,才能使民众获得心理与情感上的满足,并相信社会是正义的,从而激发民众对论证政治制度合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此,在多元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得到认可并极易发生逆向摩擦的社会空间结构中,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防止社会滑入让人“伤感”的异化境地,就成为撬动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生发点。

在传统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下,先赋性的身份标签牢牢地限制了民众基于生存比较的“思维区间”,因此,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尽管高低贵贱的落差很大,但民众对统治者竭力宣示和标榜的意识形态也往往不会产生“僭越”的思维意识。可是,在权利意识高涨,公平正义已成为广泛共识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在资源分配被少数人垄断,阶层固化等非正义社会问题凸显的情形下,民众的思维意识就会出现大幅度的“翻转”。事实上,政治实践的经验观察告诉我们,纵使民众的应得期望值非常之高,只要治国理政的方式能够对社会价值进行公平正义地分配,那么,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能在现代性的高水平上达成。从这个角度看,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绝不能去设法去降低民众的应得期望值,而是应去着力谋划能够公平正义分配社会价值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按照罗尔斯的辩护逻辑和思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法治轨道上打破资源分配的垄断和使所有民众都能平等分享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是更关乎成长远的标准选项。

蕴含着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诸种价值信念、信仰与理念的法治,不仅强有力地形塑着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制度性和程序性,而且深远地影响和左右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站在人类社会数以千计的历史年轮的宏观视域中看,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运行层面上说,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治国理政“最不坏”的方式。只有当凝结着人类智慧的法治真正浸淫到现代国家多元合作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时,人类社会也才可能在走向动态稳定的“大治”状态中实现民众执着希冀的公平正义,才能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恰如勒庞所言:“如果一种信念、信仰和感觉的体系要被人类大众接受,它必须表达人类更崇高的情感;它必须许诺公平将在世界上或者其他地方大行其道,或者它必须宣称善良的愿望将得到报偿,邪恶将被惩罚。”<sup>③</sup>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sup>④</sup>。当前,面临着贫富差距渐次扩大、问题复杂矛盾相互纠缠、治理难度前所未有等必须破解的社会难题,唯有更加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这个集中体现公平正义的治国理政方式,寻求制度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动态和谐和实现公平正义之道,才能保障广大民众共享社会发展“红利”。为此,要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健全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通过民主立法来广泛听取与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拓宽立法机关和民众沟通渠道,开展立法协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夯实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sup>⑤</sup>以此驯服权力、赢得民心、凝聚共识、为民谋福祉,以“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以从根本

①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8页。

②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③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上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四、结语

对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局历史坐标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终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词”。无需经由繁琐的逻辑论证,便可以得出,不断夯实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是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将如此。

其实,夯实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全面深化改革或曰社会整体性改造的一部分。尽管,宏大的社会实践运动可以迅速地涤荡政治制度本身的痼疾,但对于形塑民众思想意识这种深层次的变革时却收效甚微。如是,设若仅仅把主流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体制化的、为作为精英阶层的推行主体所垄断并把广大民众拒斥于外的一种语言系统,那么,它既无法有效地“输出”有效的政治信息,也不能激荡起民众的情感共鸣。因此,夯实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言辞灌输或政治劝谕的选择,更担当着民众表达自我和养成价值自觉的内在革命功能。所以,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要为国家提供道德意义上的文化支持,通过成为“国语”来夯实民众的认同,凝聚民众的价值共识,格外有必要紧紧追踪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脉搏的律动,敏锐地捕捉民众释放出的利益诉求等政治信息,深刻洞察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生发规律,在物质、民主和法治这三大维度的转译界面上,把抽象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细节,推动“文”与“行”的合一,汇聚正能量,才能将承载着诸种价值理念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扎根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并沉积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取舍与选择的价值自觉。

(责任编辑:王永贵)

### **Mak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ranslatable at Different Interfaces: An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Consolidati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It**

SHI Xian-zhi, YAN Feng-lian

**Abstract:** Within the modern Chinese social space where people's ideas and values are changing rapidly and multiple social trends ar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acceptance of and obedience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because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CPC's governance, the success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hinese dream for a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de-ideologicalization going together with re-ideologicalization, through constructing three translation interfaces (i.e. interfaces between ideology and material, democracy as well as law),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hich is relatively abstract and removed from people's daily lif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a form which is able to take root in people's mind from its original form characterized by big theories and grand narratives. Through these translation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ill evolve into an integral part of people's mentality and value system. In this sense, mak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ranslatable at different interfaces provides us with an effective wa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consolidate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it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Key words:** mainstream ideology; interface of translation;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